

◀ (上接10版)

(《礼记·乐记》)

“乐所以修内也，礼所以修外也。礼乐交错于中，发形于外，是故其成也悖，恭敬而温文。”(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)

礼乐教化，主要是和谐并提升百姓的素养的。礼乐之教把天地精神、人的性情与日用伦常贯穿起来了。礼乐的社会功能，尤其是与法律、政令相配合，使社会和谐。礼乐之中有秩序、节度、交往、和谐的原则与原理。在“礼”这种伦理秩序中，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、道德价值。荀子推崇“礼”为“道德之极”、“治辨之极”、“人道之极”，因为“礼”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，老者受孝，长者受悌，幼者得到慈爱，贱者得到恩惠。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，含有敬、孝、悌、慈、惠诸德，以及弱者、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。

“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。礼尚往来：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人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，故曰‘礼者，不可不学也’。夫礼者，自卑而尊人，虽负贩者，必有尊也，而况富贵乎？富贵而知好礼，则不骄不淫；贫贱而知好礼，则志不慑。”(《礼记·曲礼上》)

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：以德为贵，自谦并尊重别人，讲究施惠与报答，礼尚往来。无论富贵或贫贱，都互相尊重，互利互惠。这里提到对负贩、贫贱等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。过去我们对“礼不下庶人”的理解有误，据清代人孙希旦的注释，“礼不下庶人”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，而不是说对庶人无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。古时制礼，自士以上，如冠礼、婚礼、相见礼等都是士礼，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，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，在节文与仪物诸方面量力而行。

在社会治理上，儒家重视道德教化，同时重视法治。《王制》中也有刑罚制度的记录与设计。涉及在审案、判案、处罚过程中如何审慎、认真，避免冤案，严格程序及对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。

《周礼·地官司徒》、《王制》中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中，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原始人道主义，体现了中华民族以“仁爱”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人文精神。其中，有不少制度文明的成果值得我们重视。如有关应对灾荒、瘟疫，予以组织化救助的制度，有关对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、贫困者等社会弱者的尊重与优待的制度，都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，且后

世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发展，这都有类似今天的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因素。有关颁职事及居处、土地、赋税、商业的制度与政策中对老百姓权利与福祉的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保证，有关小民的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基本保障，有关对百姓施以道德与技能教育的制度，有关刑律制定与审判案件的慎重、程序化与私人领域的保护方面等，也都涉及今天所说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。只要我们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省视，同样是在等级制度中，以我国先秦与同时代的古希腊、古印度、古埃及的政治文明相比照，则不难看出中国政治哲学理念与制度中的可贵之处，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，希望国人不要过于轻视了。

礼乐文明中的道德理性与君子人格

《表記》讲以仁德为标准。《儒行》记载了孔子阐述儒者的十六种高尚品行，有温良、敬慎、宽裕、逊接、礼节、言谈、歌乐、散财等，皆以仁德为本。其中讲到澡身浴德，特立独行，见死而不更其守，可亲而不可劫，可近而不可迫，可杀而不可辱。

“儒有忠信以为甲冑，礼义以为干橜，戴仁而行，抱义而处。”儒者把忠信作为甲冑，把礼义作为盾牌，头戴仁而行，怀抱义而居。

“儒有不宝金玉，而忠信以为宝；不祈土地，立义以为土地；不祈多积，多文以为富。”儒者不以金玉为宝，而把忠信当作宝贝；不祈求土地，而以道义作为立身之地；不祈求多积财物，而以学识广博、多才多艺作为富有。

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。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适弗逢世，上弗援，下弗推，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，身可危也，而志不可夺也。虽危起居，竟信(伸)其志，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。其忧思有如此者。”儒者生活在现代，却与古人的意趣相合。在现代社会的行为，可以成为后世的楷模。有君子恰好生不逢时，上面没人援引，下面没人推举，谗佞谄媚的人结伙陷害他。虽然他的身体可能危险，志操却毫不动摇，虽处险境，举动行事仍然

伸展自己的志向，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。儒者的忧国哀民的心就是这样的。

“儒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；幽居而不淫，上通而不困；礼之以和为贵，忠信之美，优游之法；慕贤而容众，毁方而瓦合。其宽裕有如此者。”儒者广博地学习而无止境，切实地实行而不厌倦，隐居独处时不淫邪放纵，上通国君被重用而不会失态困窘。以礼待人，以和为贵，有忠信的美德，优游从容的风度，思慕贤人而又包容众人，有时可以磨毁自己的方正的棱角而依随众庶，犹如房瓦之垒合。儒有的宽厚容众就是这样的。熊十力、钱宾四先生等都很重视《儒行》。

《礼记》中有关人的教养与人格成长，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养成的智慧，体现了儒教文明的特色。儒家教育是多样、全面的，其内核是成德之教，其目的是培养君子，成圣成贤，其方法是用礼乐六艺浸润身心，以自我教育与调节性情心理为主，其功能在于改善政治与风俗，其特点是不脱离平凡生活，知行合一、内外合一的体验。在当代建设现代社会，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过程中，尤其需要调动儒家修养身心与涵养性情的文化资源。忠信是礼的基本精神，义理则是规矩仪式。

“先王之立礼也，有本有文。忠信，礼之本也；义理，礼之文也。无本不立，无文不行。”(《礼记·礼器》)

“故礼义也者，人之大端也，所以讲信修睦，而固人之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也；所以养生送死，事鬼神之大端也；所以达天道、顺人情之大者也。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。故坏国、丧家、亡人，必先去其礼。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

《礼运》强调礼对于的人格成长与治理国政的重要性。礼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。“故圣人修义之柄，礼之序，以治人情。故人情者，圣王之田也，脩礼以耕之，陈义以种之，讲学以耨之，本仁以聚之，播乐以安之。”(同上)这里强调礼为义之实，义为仁之节，仁是义之本，肯定“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耜而耕也；为礼不本于义，犹耕而弗种也；为义而不讲之以学，犹种而弗耨也；讲之於学而不合之以仁，犹耨而弗获也；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，犹获而弗食也；安之以乐而不达於顺，犹食而弗肥也。”(同上)

《礼运》对于人的界定，如前所述，是把人放在天地之中的。尽管人是天地之最秀者，

但人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人，人是在自然生态序列中的人。同时，人又是治理的主要对象(即“人情以为田，故人以为奥也”)。这里对人的界定，是以礼义、仁德为中心的，而人应当是道德的人。这里也强调了作为治国之本的礼，而礼的规范中，重要的是道德仁义的精神。《王制》亦强调道德教化，指出司徒之官的使命是节民性与兴民德，推行六礼、七教、八政。

《王制》重视教化，强调“节民性”与“兴民德”，肯定人文教化，发挥退休官员、乡下贤达的作用，运用射礼、乡饮酒礼等，通过习礼对民众、青年进行持续不断的教化。

“司徒脩六礼以节民性，明七教以兴民德，齐八政以防淫，一道德以同俗，养耆老以致孝，恤孤独以逮不足，上贤以崇德，简不肖以绌恶。”(《礼记·王制》)

司徒修习六礼(冠、婚、丧、祭、乡饮酒和乡射礼)，来节制民众的性情，讲明七教(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、宾客等伦理)来提高人民的德行，整顿八政(饮食、衣服、技艺、器物品类、长度单位、容量单位、计数方法、物品规格等制度和规定)来防止淫邪，规范道德来统一社会风俗，赡养老人来诱导人民孝敬长上，抚恤孤独的人来诱导人们帮助贫乏的人，尊重贤能的人以崇尚道德，检举、摒除邪恶，实在是屡教不改的人，再摒弃到远方。由此可见，王制就是道德之治。

在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的交往关系，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关系方面，儒家有极其重要的资源，尤其是“推己及人”、“将心比心”的“恕道”，“推爱”“推恩”的方式，值得珍视。“爱有差等”是具体理性、实践理性，恰可证成普爱。儒家强调主体性，特别是道德的主体性，但儒家人己、人物关系，是交互主体性的。成己、成人、成物等是仁心推扩的过程。这对今天的人际交往与文明对话有其积极意义。人的道德性尤表现为在对自然物取用上的反思性，反思贪欲、占有欲，使人更加肯定动植物自身的价值，成为宇宙大家庭中自觉维护生态伦理的成员。人的道德性也表现在社会治理上，则更加尊重庶民大众的权益，予不利者以最大的关爱，并有更多制度的保障，促成社会的和谐。这里包含了教育公平之于政治公平的基础性，促使阶级阶层间的合理流动，保证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公正。这些都是礼学的真义。

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

徐复观先生指出，中国之所谓人文，乃指礼乐之教，礼乐之治。《周易》的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，实即是兴礼乐以化成天下。“儒家的政治，首重教化；礼乐正是教化的具体内容。由礼乐所发生的教化作用，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，达到社会(原注：风俗)的谐和。由此可以了解礼乐之治，何以成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。”(徐复观：《中国艺术精神》，《徐复观全集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8页)

徐先生指出“礼乐”有三方面功能或作用。第一，在政治层面上，人把人当人看待，这是理解礼治的基础。第二，在社会层面上，建立一个“群居而不乱”，“体情而防乱”，既有秩序，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会风俗习惯。第三，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，“人的修养的根本问题，乃在生命里有情与理的对立。礼是要求能得情与理之中，因而克服这种对立所建立的生活形态”。“现代文化的危机，根源非一。但人的情感因得不到安顿以趋向横决；人的关系，因得不到和谐，以致于断绝，应当也是主要的根源。我这时提出中国人文的礼乐之教，把礼乐的根源意义，在现代中，重新加以发现，或者也是现代知识分子，值得努力的课题之一。”(徐复观：《中国思想史论集》，《徐复观全集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91、292页)徐先生此说值得我们深思，我们的确需要重新发现礼乐的现代价值。

关于“礼乐”的意义，徐先生说它包罗广大，其中之一乃在于对具体生命中的情欲的安顿，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谐和统一，以建立生活行为的中道。更使情欲向理性升进，转变原始性的生命，以成为“成己成物”的道德理性的生命，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，以担承自己，担承人类的命运。这便可以显出中国人文主义的深度，并不同于西方所谓人文主义的深度。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确有其不同，中国人文主义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，它不与宗教对立，不与自然对立，不与科学对立，的确

(下转12版) ▶